

心在高原的情怀

——读叶多多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

□陈晓兰

读叶多多散文集《我的心在高原》，首先感动我的是作者的那份痴情和执著，也许正是这份痴情与执著才令这部书有震撼人心的价值。

土地养育了生命，也养育了文学。

“文学与土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们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中看出来，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生动而鲜明，后来，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垄断，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段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

这是林贤治在《我的心在高原》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读后感触颇深。

叶多多的散文创作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从她心底深处涌动的一股清泉、一腔热血，我们读这样的散文，自然也会感受到泉水的清纯和热血的沸腾，这两者的感受越是鲜明，对作者的理解也会更多一层。

在开篇散文《两季的头几天》里，她这样写道：“一切关于哈卜玛的记忆，是从两季开始的，不大不小的寨子，居住着清一色的拉祜族，沿着坡地一家一所茅草房，参差错落，倒也自然。暗光中，屋顶的颜色有明有暗，由茅草的新旧支配，房屋周围，有着不太广阔的红壤，稀稀拉拉种着包谷和荞麦。”

通过这样的描写，让人看到一幅云南边远农村寨子的生存场景：红壤太贫瘠，庄稼耕种很艰难，但村民一年的口粮主要还得靠村边的这些土地。好在这里是澜沧江下游的河谷地区，湿度大，雨水充沛，各种可以入药的草本植物很容易生长，能吃的野菜也不少，野面瓜、山竹笋、苦凉菜、野百合，以及各种各样的山菌，都是上好的野菜，虽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得辅以野菜，但哈卜玛的所有生活都必定是从野菜开始的，在城里人看来，野菜是珍贵的，生态的，但对山里人来说无疑是贫困的象征，缺盐少油咽野菜的日子在富裕人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对山里人来说，确实实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如今，云南边远的山里人确实还生活在难以温饱的状况下，这不是传说，是作者亲身体会，亲眼看到的事实，那种在当今文明社会对村下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心酸。

在《这是一个悖论》的文章中，写到山村孩子初中毕业回家后，由于在学校没有学到基本的、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自然就不具备改变传统耕作方式的能力，又由于读

了几年书，自认为是有文化的人，因而很不屑于再干又苦又累的农活，倒是很在乎诸如喝啤酒、看影碟等城市生活方式，这样的孩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就忘得差不多了，而新的技能又没有机会学到，往往沦为山村的新混混，当地的说法叫农村二流子。另外有一种孩子则正好相反，整天苦着个脸，长吁短叹，总是抱怨怀才不遇，山寨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如同受刑，但又找不到奔逃的办法，无奈中却惟独不愿重走父辈们盘田种地的路，哪怕是为了暂时的自救，这种景况怎能不让父母对读书的心事存疑虑。

这就是山村农民的现状，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知识是用来改变社会、改变人命运的，而在边远山村，因为有那么一点知识的人，且不能人尽所用，人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难道不是山村人的悲剧吗？

在没有小学的小山村，在外村借读的小学生娜俚的周记里写道：“我的家在一个小山窝里，那里只有九户人家。村口横着一道山簪，村里人只好在山簪的两边塔上两根木头，上面铺一些竹子，造一座简易木桥，每逢下雨的时候，簪里的水都会暴涨起来，谁也不敢过去，扎体的阿妈就是去年给冲走的，那天她背着一口袋包谷去赶集换米，刚走到桥上就下来一股洪水，转眼就把她冲没了影。”

这些都是叶多多文笔下活生生的事实，10多年来她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到了别人无法也不能够去的地方，了解、看到了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生存的艰难使孩子们变得格外成熟和坚强，他们从一出生就承担着现实的不幸，他们已经习惯咀嚼痛苦，习惯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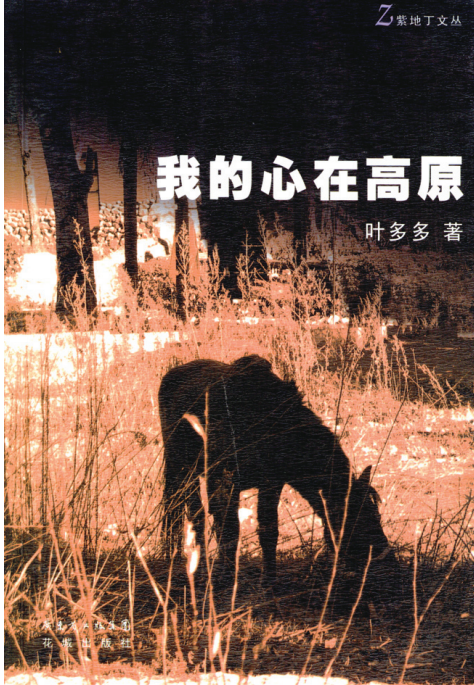
叶多多为此书起名《我的心在高原》是发自她内心深处的声音，她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有了数次的山村经历，去的次数多了，自然结识了不少山民，免不了经常有人找我借钱，或央求帮忙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顿、难题。开始我总是尽力而为的，我希望发生奇迹，我更希望我的努力能够使他们多坚持一些，然而很难，后来，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心里充满了无奈的忧伤。

杯水车薪，我距他们的需求相当遥远。

然而，内心的重力却让作者没有因为回避而有些许的轻松，相反，她变得更加脆弱而敏感。不得不承认，零距离接触乡村是毫无美感甚至是丑陋的，因此，从不轻易地赞美乡村，一直都是这样。

这是经历了贫穷、落后，甚至是恐怖之后对乡村的深刻印象，心在高原的呐喊是作者的真实目的，因为她看到的、



写到的是真正的乡村，真正的乡村生活及生存状态，这可能也是她这部作品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主要原因，我想评委真是慧眼，发现并充分肯定了她作品的价值。

叶多多是一位富有哲学思想的作家，她笔下的人物都是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的喜怒哀乐都跃然纸上，她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自身也在与他们一起尝受着这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她把 these 感受沁入到自己的骨髓和血液中。

她对生存及文化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今天，云南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有很多人穿着民族服装招徕生意，出售各种民族服饰的摊点更是鳞次栉比，加工和出售民族服装已经成为各民族旅游景区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有趣的是，卖服装的人穿民族服装只是为了招徕，买服装的人则是为了纪念和收藏。就是说，这些服装既远离了其最基本的功能，也与世俗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彻底沦为一种与鲜活生命没有任何关系的博物馆化和旅游市场化的“死”文化。

“死”文化对人类、社会又有多大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作为一个作家，叶多多看到的是“实质”，而不仅仅限于文化。

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作家，她写的是最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她让我们看到现实，并提醒世人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需要我们的热爱及社会各界人士更多的关心，给他们温暖，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应有的爱吧。

一个使脑海扬帆的预言

——评长篇科幻小说《越魂》

□虔 谦

《越魂》的思维和创意方式令我的思路几度急弯难转，甚至瞠目结舌。而作者绿无双却这样对我说：“我不是在瞎幻想，谷歌工程师预言，2045年，人脑的思维可以上传至电脑。”

乘着这双超前意识的翅膀，作者发挥了他敏锐的抽象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把一个既线条清晰又令人眩晕的意识迷宫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要读过此书的人都难以置信，作者逻辑思维的严谨性的确有着扎实的科技基础。作者还说：“我不认为《越魂》是一部单纯的科幻小说，它还是一部富含前瞻性的预言小说。”《越魂》的主要视野，在于微观的人的自身。它触摸人的内心世界，无论出现的是孤独、痛苦、忧伤、绝望，亦或是焦虑、阴郁等等生命挣扎的现象，作者都试图通过自身的正能量和潜在的能力摆脱那些挣扎，从而平安地生存在快乐之中。

《越魂》对人的关注不仅体现在它的故事情节和字里行间，更体现在作者对脑电波技术造福人类的信念上。作者说道：“如果建立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软

曾读过何泽勋的《最后的行者》《行走在边缘》等诗集，与其他同代诗人比，何泽勋的诗陈现代品质外，在诗的内容、体式、意蕴方面相差无几。但可以看出他的诗的“故意”，他不是海姓诗人的个体意识无限张扬，也不是顾姓诗人的自我恣肆，更不效仿第三代、第四代“先锋派”诗人的标新立异。他固守传统而自醒，他扎根土地而慕群。在诗美的大前提下，追求诗的纯正、明朗、清新、意远是他的所思、所想、所工。这些潜质成就了何泽勋的今天。

当一首(部)诗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符号时，这个诗人是被历史记住的人。何泽勋是不是这样一位诗人呢？我说，读者若了解21世纪的乡村现状，若想知道中国转型时期农村行世中的“疼痛”，请读他的诗集《空村》。《空村》是这个时代乡村诗的备忘录。

站在何泽勋创作的至高点俯视他的创作态势，《空村》就是他占领的一个高地。是他脚足了劲、调动了全部潜能、有的放矢地攻克上去的高峰。成功的作家和诗人在创作高潮期或说成熟期，都有一个“精神还乡”的显灵期，不管他身居何方，这是文学创作的特殊现象。据我所知，小说家李英儒、浩然、莫言、石钟山、阎连科，诗人张志民、李学繁、李季，莫不如此。莫言、石钟山、阎连科是军人出身，开始东写西写，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莫言转向河南乡下的沙土地、石钟山转向东北小时生活的大杂院，眼前豁然开朗，笔下浪涛汹涌，才站稳了脚跟。

不是说只能写故乡才能写出惊世之作，而是指作家的胸襟、修养、怀抱、本真。“精神还乡”是立场、是初衷、是情愫、是根基。无论写什么，乡土的根基站稳了，乡土的情愫保鲜了，乡土的初衷、本真还在，写出的作品自然厚重了。

何泽勋的《空村》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可谓翻天覆地，前后已成两重天地。有专家称中国已经走出了农业文明的羁绊，在现代化的“补课”中，逐步完成了工业文明的覆盖，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的命题讨论之中。但中国仍处于当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互渗的文化语境，经济发达区域与中西部“文化滞差”明显，现代性越来越表现其残缺性。尤其是商品大潮的袭来，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在瓦解，道德在沦丧。在农村，一方面是大量

新时期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几十年之间，似乎走过了西方数百年之流变的探索和创造之路。这种变化与大量翻译和引进经典的美学专著与诗歌文本有着密切关系。诚然，整个世界精神的血液循环增强了中国新诗的生命力，曾经历了一场美丽的混乱与泥沙俱下的大潮冲击，多元的艺术观念、对诗之本质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方向的探索和创造，构成了新诗纷繁复杂却又呈现勃勃生机的局面。在当今的世界，任何国度都没有像中国这样，诗的视野如此开阔，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和研究。当我们和异域诗人交谈的时候，中国诗人的信息量之大、对整个世界诗之走向的把握大抵与世界同步。而中国诗人的最好作品与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作相较亦毫不逊色。或许出现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的诗人还需要时间，但中国诗歌的成熟和潜在的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人已逐渐沉下心来，进入一种自主的创造状态。一些诗人更钟情于母语，在吸收外来营养的同时，又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寻根溯源，最大限度地拓展汉语的精神疆界，创造出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诗篇，对于中国新诗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对文学地理学没有研究，但事实告诉我，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诗歌群体都有明显的地域性。最初以北京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群，继而四川诗人的整体登场，及至后来的边塞诗，甘肃、江苏、浙江以及云南、福建诗群的出现，都成为中国诗歌的劲旅，形成了丰富、美丽而神奇的诗的风景区。如今，山东青年诗群又集体亮相，以其个性相异之都充满了创造力的作品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路也、王夫刚、邵筐、蓝野、东涯、轩辕轼轲、寒烟、阿华、李辉和木鱼儿这10位诗人，都有读了令人心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力作。其中一半以上的诗人都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影响，当然，也有江非这样，虽然水准颇高但已被海南聘走的诗人不在其中，仍有一些写得不错的诗人，如孙磊、宇向等由于名额的限制并未入围。看来，山东作为一个诗歌大省已名副其实。而山东作协能关注这批青年诗人，亦令人感佩。在当下以小说一统天下的文坛，只有那些真正理解文学真谛的文学组织者以及高层次的优秀小说家才明了诗作为文学灵魂的意义。

一个地域诗歌群体的形成，首要原因该是此文开篇所言的诗歌生态大环境的催化作用。而地域特有的文化基因的传递、风土人情以及自然生态所带来的影响，该有着文化血缘内在构成所奠定的创造根基，但由于每个写作者气质、性格、生命阅历与艺术观念的不同，其共性中亦有相异的个性。但作为诗而言，地域特色、文化传承、风俗俚语等等固然在起作用，但人文背景只有作为语境而存在，更重要的则是艺术感觉的敏锐，这是具有发现性的对人与事物的深入独到的理解和洞悟，是形成于诗学结构的判断、理解和创造，是一种诗性意义的表达。

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也是重义气出梁山好汉的地方，甚至是出善良美好的狐狸精的地方；是用红嫂的乳汁哺育一个新政权的地方，当然也是撒农药毒姜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旧相信山东人的淳朴善良、重义重情、坚韧且吃苦耐劳，一腔豪气充满血性的特质，丝毫不怀疑其强劲的创新力。如今的高密东北乡已驰名世界。我相信山东青年诗群的作品亦能插上翅膀，取得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

现自己莫名其妙地置身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噩梦初醒的惊疑尚未弄清，紧接着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他震惊、无绪、焦灼、失忆……而原本为了掩盖一个阴谋将夏夜置于死地的刑斌，却阴差阳错地用另一种形式使夏夜接近真相：即过量的电击造就了夏夜的“越魂”功能，以至很快地进入了脑电波博韦何坚的意识世界。情势就这样扑朔迷离并危机四伏地向前延伸，紧紧揪住了读者的心。

《越魂》塑造的人物鲜明并富有层次，人格的双重性，有历时上的发展，也有共时上的交织。这一点在狄天启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小说另一人物刑斌，这个几乎全然可憎的人物，作者仍给予了他童年不幸引起性格畸变的注脚：他的长相和身材，从小就受人歧视；他是在别人的嘲笑声中长大的；他的心理从一开始就没能健康地成长；他的童年很孤独，总是被人欺负。所以，他总是把自己受到的委屈转嫁到其他的东西上。于是他爱上了虐杀小动物，他喜欢残忍地将它们肢解。他选择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完全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看到别人在精神受到折磨后失控的百态。

《越魂》有不少出色的细节描写，很好地深化了作品的内核，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和故事，并使文意更具生动性。除了人物、故事和细节外，《越魂》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奇伟的科幻和深刻的哲思。

诗人凝望的村庄

——读何泽勋诗集《空村》

□峭 岩

涉，打工潮、进城热、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一下子掏空了农村。另一方面是党的农村政策空前优惠，免地税、土地补贴、医改、三通、四美，现代化的手段覆盖农村。一进一出，阴阳交错，空前地改变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上，城乡并进，城市改革之后便是农村，因此农村成为焦点。此时，何泽勋把写农村作为突破口可说是明智的选择。

《空村》所说的乡村真的“空”了吗？正如我初读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空村不空。”何意也？就诗意而言，《空村》传达给我们的是一段历史的断面而已，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中国的农业文明几千年，优胜劣汰是个必然。小桥、流水、人家，鸡鸣、炊烟、谷香，是好的自然生态。但农村不能固守不变，在历史发展尤其是向城镇化迈进的过程中是要经历阵痛的。我们与何泽勋期许永恒的是乡情、亲情、质朴、纯净、真诚，与世长存。

不是吗？在开篇《博物馆里的村庄》里，诗人坦露了这种担忧：“没有人留守或者离开/在一些喧嚣的午后，人群蛻变/用陌生的一切，装饰脸和牙齿/迁移的谎言流动在任意角落/包括爱情，只有在陈列的台词中出现//城市的边缘，墓穴被挖开/族谱和青铜一样在霉烂/有人寻找合适的价格，变卖/祖宗的遗体 and 仅有的良知/在空虚中透支灵魂。”

显然，写农村的大变数是个重大的命题，是需要文化命脉、思想深邃、诗艺技巧作功底的。首先，何泽勋是清醒的，在诗艺的拿捏上有足够准备的。他冲上高地，凝视与回望农村，心中百感而焦虑。“衰老的村庄/再也托不起乡亲的生活/在一些黎明或傍晚/人们，选择远走。”（《沉默的村庄》）这是现实的剖面。“季节毫无意义/祖父，用最后的信念/将自留地的泥土/铺在榕树下/在无法思考的方寸之间/守护最后的领地。”（《土地》）这是难舍的意绪。“在某些角落/方言和烈酒一起烂醉/然后被骗到女人的床上/消失，或者消灭//直到村庄沦陷/

回望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

□孙武臣

作家张庆和一篇1500字的短散文《海边，望着浪花》，多次被几个省市中学选作考题或编入教材，凸显了文学的力量。真正的文学理应有灵魂有内涵，能够容纳时代风云、能够把握社会脉动的文学是可读又耐读的文字。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才能进入历史。“探访这片中国近代史的始源地，祭祀在这里为国殉难的英雄儿女，曾经是我许久的心愿。”作者以一个作家的赤子情怀，以诗意的笔法复活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我们那段耻辱历史，那个腐朽的清末社会，那场丧失尊严的人生。

全文分为“大海在倾诉”、“大海在痛哭”、“大海在叩问和历史在嘱咐”三个部分，即从三个思维层面为一个世纪的中国屈辱历史作出了至情至性的表达。

“大海在倾诉”，倾诉了鸦片战争的历史事件。使逝去的历史又变成看得见的历史，那是我们永远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倾诉”历史事件并非全文重点，但能让我们感受到那泣血的历史之痛。“大海在痛哭”，为那段历史悲剧而恸哭，为在这场悲剧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华英雄儿女而恸哭。恸哭是回忆历史灾难时的情感抒发，但仍不是全文的重点。重点在“大海在叩问”，“历史在嘱咐”。当作家的目光集中到那弯曲着的长长的虎门炮台的事物时，立即生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于是那弯曲的炮台便幻化成了“宛若一个大大的问号。在问天，在问地，似乎也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其“意义”应该涵盖哪些超越时空的方面呢？

首先是总结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散文中有一段文字：“虎门的布防，不谓不周；清军将士不谓不勇。然而他们却失败了，败得很惨，数千忠勇无一生还，全部壮烈在这里。”但是，“从根本上说，杀死他们的，不是英军，也不是英军的坚船利炮，而是清王朝自己。是朝廷里那些吮尽人民骨髓的昏庸的权力持有者，是那个喂养着无数蛀虫、腐朽污浊的社会渊数那个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一面镜子。鸦片战争这面“镜子”映照出的是清王朝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朝廷官员的奢迷腐败，国力必然羸弱。于是，只有毁灭衰亡的命运悲剧，这是历史之必然。当我们回想中华民族这次永远的泣血之痛时，我们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经过30年可歌可泣的伟大凝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样又经过30年可歌可泣的伟大凝聚，中国人民走向了繁荣富强，赢得了全世界的惊叹与尊敬。“换了人间”，是否定不了的历史真实。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生存不易，而赢得和维护她的尊严则更难。

创造和利用好一切良好的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变得更强更大，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就是我们回望历史、启示现实和未来的目的。

再有，思考历史事件的启示意义时，还不能忘记在“镜子”中认识自己的影像。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遭受无数的灾难，屡遭侵略，却总能劫后重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尤其在最近30多年里还能在复兴中重现青春活力，真的见证了恩格斯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当我们从这一精神层面去回望历史时就能感悟：苦难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它带给我们一种民族精神和人生态度，那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是我们民族的集体人格。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我们过往的岁月中，使我们做到了最难的事：认识自己——并从历史的重量中获得了挫折历练后的豁然和达观、坚强和自信。海明威的名言“人可以被打败，却不可以被战胜”也适合中华民族，因为她大写了最难写的“人”字。

历史观决定了作家在这篇散文中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铭鉴历史时充盈着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散文结尾，作家描写了海边一道彩虹般的风景区。“海潮退去了，岸边走来一群拾贝壳的少男少女。他们嬉笑，他们追逐，他们不时地弯腰拾起一枚枚喜悦，或者扬手放飞心中的满足……”我们从读出了作家心中的一个悖论：我们奋争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们不再经历我们遭受过的灾难，但又多么希冀他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灾难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后来人身上理应有我们民族精神传承的脉络。

作家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在德育整体性缺失的当下，历史有被淡忘的倾向。比如中学的历史课，课内变异成了应试教育：课外被“戏说”、“歪说”、娱乐素材。这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有害的。无怪历史学家大声疾呼：中学历史课堂不能“失守”。要发起一场“保卫战”，因为历史课对学生培养正确价值观太重要了，它可以使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懂得爱自己的祖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边，望着浪花》为教育教學界所看重绝非偶然。它提醒人们：只有记住昨天的苦难，才能更好地拥抱和谐美好的明天。

这篇散文弥散着作家的理性与情感的智慧，呈现出理性和充满诗意的艺术把特点。诗人将“意象”的诗性移植到散文中，是散文写作成功的关键。作家把“石堡”、“岸炮”、“硝烟池”、“雕像”、“炮台”、“花”、“草”、“海潮”、“贝壳”等物象都作为他的哲思与情感抒发的载体，并通过艺术想象力化为他的心象。自然，在意象原则与方法的运用中，拟人、比喻等修辞方法都为散文创造了“意象美”和“意境美”。

崛起的山东诗群

□韩作荣